

苏联大军压境

1969 年在京中央领导人紧急疏散

核心提示

1969年3月至8月间,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事件,之后,大军压境的苏联于下半年又私下向美国等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展了防范苏联侵华战争的紧张战备和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的工作。

中央发出疏散令

从1969年3月初开始,全国战备紧急疏散开展起来。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其中说:“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全部消灭。”

到8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地区革委会、人民解放军驻边疆地区部队,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命令还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实行归口大联合,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要求山西省部分地区制止武斗、惩办坏人,恢复生产与工作),大力支持前线,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八二八命令”的发布,迅速整治了仍然存在派性斗争、武斗和打砸抢等混乱局面的地区。

从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重要战备活动之一。

在京的中央大批党政机关干部以及北京主要单位、学校的职工,被紧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暂时先疏散至郊区。

边境地区的军政机关,如黑龙江黑河地区的革委会、军分区也向内地迁移,吉林市计划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至农村。

许多高校也紧急迁出城市。北京大学的师生一部分被疏散到汉中,一部分被疏散到江西鄱阳湖畔;北师大的师生

被疏散到西郊东方红炼油厂;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中央广播学院迁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学院迁到湖北潜江;北京农业大学先迁河北涿县,后迁到陕西甘泉。

离开“牛棚”不久的中国曲协副主席、作家陶铸这样回忆:“北京市内一片慌乱,一些在外地有关系的住户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旧家具的店铺,以贱价收购了大量的家具。我把各家的人叫了来,把大衣、樟木箱子、书架、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或选集都装箱运回乡下。”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在北京站登火车时,秩序大乱,犹如逃难的难民。”韦韬回忆说:“北京疏散,中心是要把北京的所有‘闲杂人员’、‘危险分子’统统疏散到内地去‘监护’;把业务已停专事斗批改的机关单位,统统迁往农村,或办‘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把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文件、珍贵资料,集中装箱运往‘三线’保存。”

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同日,毛泽东离京去了武汉。

老同志被沿京广线安排

10月17日,北京市革委会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包括体操、排球、篮球和乒乓球在内的体育表演晚会,观众近2万人,其中被邀请观看的外宾有2000余人,董必武、朱德、邓子恢、陈云、李富春、陈毅、叶剑英、王震等应邀参加。会前,他们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晚会请务必出席。

在休息室里,周恩来向他们宣布了战备疏散的决定,并宣布了他们的疏散地点。他还嘱咐他们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

对于被监护的对象,则是单独通知的。

10月15日,中办主任汪东兴派人把陶铸的妻子曾志找去,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要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自己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曾志回家告知陶铸,陶铸沉思良久,决定不让曾志去:“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

17日,汪东兴来到福祿居,通知刘少奇的几个卫士:“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休息,到开封。”卫士进卧室对刘少奇说了,刘少奇一言不发。卫士用蘸了紫药水的棉签在纸上写道:“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休息。”刘扭头不看。

老同志大多数被安排在京广线及其附近地区,毛泽东说:“万一打起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开这些人呢。”

经过个别调整,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而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原因禁地。

这些疏散至外地的人同时还被要求,离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缴;各人参加所在地工厂、农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不经中央批准,不允许重返北京。

一些部级高干也被疏散:何长工去江西峡江,胡耀邦去河南潢川,谷牧去四川……住在北京海运仓招待所的宋任穷、黄火青、黄欧东、陈再道、钟汉华、秦基伟等人,也被紧急疏散。宋任穷去盘锦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成芳等6人去湖南汉寿。

秦基伟回忆:“一天深夜,突然来了几个人,找我们这些人逐个谈话,宣布军委办事组的决定,要我们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去外地,并且不得互相打听将要去的地点。这几个人一走,楼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经交谈,得知我们被分到四面八方。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没有。大家面面相觑,心情都很沉重,谁也闹不清这次流放意味着什么,命运又将如何。”



1969年,珍宝岛地区的解放军边防战士在巡逻。

处在审查期间的高干无异于被“发配”

10月17日、18日,在严密的戒备下,刘少奇、陶铸先后离京。

20日离京的人最多,有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徐向前、刘伯承、陈云、谭震林、王震和王稼祥等。

深夜,军委办事组派两人来到长期患病的徐海东大将的床前,要求他两天之内离开北京:“你必须两天以内离开,这是毛主席的命令。”

21日,陈毅离京(原定20日离京,因清理文件多,请示总理被批准延后一日)。同日,徐海东带着氧气袋离京去郑州。

22日,邓小平离京。

一些还处在被审查期间的高干,是被押送至抵达安排地点的。刘少奇、陶铸自不必说,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一路都有专案组人员“陪同”。秦基伟等人也是如此,秦基伟后来回忆:“在火车上,我的卧铺对面是8341部队的一名排长,是专门监视我们的。白天,他寸步不离;晚上,我在床上动一下,他就要翻身起来看个究竟。后来我听说,在这批被勒令离京的高级干部中,有的甚至连与他同行的爱人也受到监视。在火车上去厕所不准关门,说是怕自杀。”

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及家属住在广州郊区从化的温泉宾馆,生活环境虽然清静,但活动受到限制。平时,他们只能在附近被划定的区域内活动,离开宾馆需要经过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康克清回忆:“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

邓小平住在南昌市郊区,在附近的一家工厂参加体力劳动,上半天班。每日上下班有人持枪“保护”,平时有武装军人值班看守他居住的大院。一个多月以后,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汇报生活和工作情况,并说:“我们过得非常愉快。”邓小平严格遵守规定,不与外人接触,1970年2月写信汇报说:“除到工厂外,我和卓琳没有出去过。我们除给自己的孩子们通信外,绝没有同过去的熟人有任何来往。”

秦基伟等6人被送到湖南省汉寿县境内的一个部队农场——西湖农场监督劳动,他们6人被分到6个连队,规定相互间不准往来。秦基伟回忆:“我们几个人虽然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在政治上完全被打入了另册。我想订两份报纸,不行。写家信,寄出前要送上面审查。家里来信,到我手前也要审查,被认为不该写的一律抹去。1970年的一天,选举四届人大的军队代表,连长对我说:老秦,你不用去了,回去看书吧。我当时心里又难受又气愤。心想,革命几十年,反倒连个公民权都没了。”

刘少奇、陶铸身死疏散地

1970年春,在职的中央领导人返京。毛泽东于4月27日返回北京,林彪约在三四月间返京。而那些“靠边站”的高干,除因中央工作需要和因病需回京治疗于1970年返京以外,其他人在1971年至1973年间,陆续返回北京。

住在从化温泉宾馆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于1970年7月奉调返回北京;朱德被通知:毛主席要朱老总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宪法,即刻返京;叶剑英奉调回京;1970年秋谷牧奉调回京;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又通知徐向前回京;秦基伟等6人于1973年4月离开农场回京。

患病回京治疗,须得到中央领导批准。如陈毅腹痛、便血,李富春患牙病,陈云患眼疾,聂荣臻患皮肤病,王稼祥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曾山患痔病,分别经周恩来或毛泽东批准,于1970年至1972年间先后回京治疗。陈毅于1970年10月21日回到北京,经诊断,患的是结肠癌。

邓小平、谭震林等人呈信中央,得到批准后回京。

邓小平曾多次写信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思想。1972年8月1日又呈信毛泽东,表示:“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5年多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1973年1月,中央通知邓小平近期返回北京。

谭震林在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给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表示回京的愿望,并对过去作了检讨,毛泽东接信后,迅速指示办理,并指示将谭信“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次年年初,谭震林返回了北京。

贺诚给毛泽东写信,得到毛的批示:“我意应予工作。”不久贺诚便从山西回到了北京。而刘少奇、陶铸、张闻天和徐海东则把生命留在了外地,没能返回北京。

1969年11月12日和30日,刘少奇、陶铸在离京的第26天和第43天,分别因急性肺炎和癌症,死于囚禁地开封、合肥。徐海东夫妇住在郑州城郊的一个干部休养所,1970年2月,徐海东患了肺炎。接着发生心力衰竭,3月25日病逝。张闻天于1972年、1973年两次致信毛泽东并党中央,请求返回北京。1974年2月,张闻天在监管生活结束后,又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一是希望回京度晚年,二是希望中央能给予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机会,1975年4月,就迁居事,致函中组部,提出如上海不成,苏州或无锡也可以。6月9日,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8月,张闻天迁居无锡。(据人民网)

